

蔣介石的功過是非

● 楊天石

一 史家功過論難休

蔣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世居武嶺溪口。生於1887年（戊戌變法前十一年）10月31日，逝世於1975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前一年）4月5日，年八十九歲。蔣介石長期擔任民國的第一把手，集黨權（蔣總裁）、軍權（蔣委員長）、政權（蔣主席、蔣總統）於一身，是近代中國許多重大事件的參與者、決策者和領導者，十分重要，也十分複雜。

2006年，我到溪口參觀蔣介石故居，寫過一首小詩：「文昌高閣枕清流，老樹依然旁小樓。大浪淘沙人已遠，史家功過論難休。」多年來，人們對蔣有過懸殊很大的評價；在不同時期，毛澤東也有過懸殊很大的評價。

對蔣介石的評價關係到：一、尊重歷史，公平、公正地對待歷史，正確記錄歷史，提高中國近代史研究的

科學水平；二、正確總結歷史經驗、評價人物；三、團結全球愛國華人（包括台灣同胞），統一中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近年來，人們對若干歷史問題的認識已有變化：例如，設在盧溝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有一個展區，原來的標題是「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後來改為「正面戰場，繼續作戰」。這一改變，標誌着相關史觀的發展和進步。以下我將講述自己對蔣介石「功過是非」這一問題的看法，供諸位思考、討論、批評。

二 蔣介石的三大功與三大過

在中國近代史上，蔣介石有三大功，三大過。

第一大功：繼承孫中山遺志，聯合中共，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自

* 2023年4月18日，筆者於香港中文大學第四屆「陳克文中國近代史講座」演講，此為當時演講的修訂稿。

廣州北伐，擊敗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大集團，結束軍閥分裂狀態，形式上初步統一中國。

第二大功：對內聯合中共，形成民族統一戰線，對外聯合蘇聯、美國、英國等二十六國，形成國際反法西斯陣營，進行抗日民族戰爭，取得完全、徹底勝利。

戰前，日中兩國國力、軍力存在巨大的強弱差距。日本是當時世界的工業強國，中國是衰弱、落後的農業國。1937年，日本工業總產值約60億美元，中國約13.61億美元，日本是中國的四倍還要多。日本的鋼產量每年580萬噸，中國僅4萬噸，日本是中國的145倍。

日中兩國的差距也表現在國家的統一與分裂的歧異上。日本實行天皇制，國家統一、上下齊心，弘揚武士道精神。中國方面，國共兩黨正在搏鬥。日本人在東北成立偽滿洲國，廣東、廣西、四川、雲南等省的統治者各懷異志，南京國民政府的號令範圍只限於長江中下游幾個省。

在軍力上，1937年日本每年能生產飛機1,580架、大口徑火炮744門、坦克330輛、汽車9,500餘輛，中國則不能生產一架飛機、一門大口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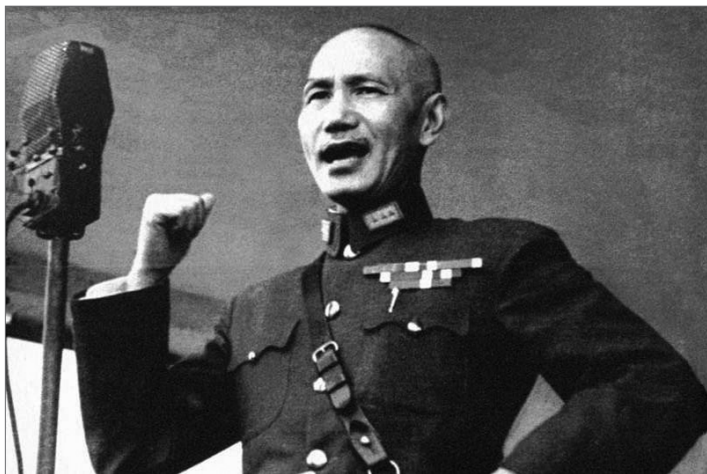
火炮、一輛坦克、一輛汽車。戰前日本總兵力約448萬人，中國總兵力約200萬人；日本有作戰飛機1,600架，中國只有223架；日軍每師有541挺輕機槍，中國僅274挺；日軍每師有104挺重機槍，中國僅54挺；日軍每師有64門野山炮，中國僅9門^①。

可見，戰前日本經濟力量、軍事力量處於絕對優勢，中國處於絕對劣勢。古語云：「棋逢對手」，當時中日兩國遠非對手。

蔣介石和國民黨內部長期患有「恐日症」。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蔣對日長期妥協、退讓。一是因為蔣要剿共，貫徹「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二是害怕日本的武力。他曾認為，中日開戰，日軍三天內就可以佔領中國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區，截斷軍事、交通、金融命脈。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國民黨內或主和，或主戰。軍事委員會常委徐永昌建言：「對日如能容忍，總以努力容忍為是。」^②他託人轉告外交部長王寵惠：「在能容忍的情勢下，總向和平途徑為上計。」^③部分學者，比如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教授胡適都主張「忍痛求和」，認為中國和日本打，精華、元氣將全毀。胡適表示，他要作最後一次努力，再爭取五十年的和平。他通過蔣介石的秘書陳布雷致函蔣，建議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④。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提出「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盧溝橋事變爆發，蔣認為已到「最後關頭」，談話稱：「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⑤這是蔣改變妥協政策、號召抗戰的談



蔣介石領導抗日戰爭，取得完全、徹底勝利。(資料圖片)

話。部分出席廬山會議的國民黨官員反對蔣的談話。該談話最初擬名〈為廬案告國民書〉，但很多人不同意，「人之為危，阻不欲發」^⑥。有人甚至譏之為「有些投機性」^⑦。蔣決心發表，於是改名為「廬山談話」，既表明中國政府的態度，又減弱它的衝擊力量。《蔣介石日記》云：「預備應戰與決戰之責任，願由一身負之。」^⑧

蔣介石長期「剿共」，貫徹其「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其內心有矛盾。1933年1月20日，他在日記中說：「倭寇」與「赤匪」，必須丟下一個，專門對付一個。蔣擔心專注應對「倭寇」，中共將發展坐大，國民政府有被推翻的危險；但是他認為：「以天理與人情推之，今日之事應先倭寇而後赤匪也。」

從1935年底開始，蔣介石準備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對蘇，一個是對共。1935年8月1日，中共發表在莫斯科起草的〈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停止內戰，集中國力，召集願意參加抗戰的黨派、團體、政治家談判，成立國防政府。國民黨駐蘇聯使館的武官鄧文儀迅速通知蔣。蔣認為這是可以抓住的時機，決定統一全國力量抗日。

蔣介石通過幾條渠道找尋和中共的聯繫，其一是宋慶齡。宋在上海找到牧師董健吾。董的公開身份是宗教人員，實是中共黨員。宋派董到陝北。1936年3月，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董，表示中共願和國民黨談判。11月，陳立夫作為國民黨代表，潘漢年作為中共代表開始談判。12月12日，發生西安事變。蔣介石通過宋子文、宋美齡向周恩來提出，只要中共同意取消中華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名義，放棄

階級鬥爭，服從「委員長」的領導，就可以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在1937年的杭州談判與廬山兩次談判中，蔣要求將中共武裝納入國民黨軍隊系統，資遣毛澤東等出洋，取消共產黨黨名，絕對服從，絕對一致。

自1927年開始，蔣介石反共「清黨」，中蘇兩國在1929年斷絕外交關係。日本侵略迫使蔣思考，要恢復中蘇邦交，聯蘇制日。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二年，蔣派人和蘇聯談判，將此視為對日本的「第一打擊」。1935年，蔣要求訂立中蘇互助條約，蘇聯擔心得罪日本，又希望中國軍隊在戰場上拖住日本，提出訂立中蘇兩國互不侵犯條約。兩國間長期爭執，蔣妥協。1937年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此後，蘇聯給了中國有力支援，提供飛機、大炮、彈藥和空軍志願人員。中日曾在武漢上空進行過多次空戰，其中就有蘇聯的志願參戰人員。蘇聯從兩條道路提供武器、彈藥。一條通過外蒙古、內蒙古、山西大同、太原到華中；另一條從新疆、陝西、河南，通過隴海路，到達中國的中部和東部。

1937年8月1日，蔣介石邀毛澤東、朱德、葉劍英到南京討論國防。周恩來、朱德、葉劍英應邀，雙方讓步，決定將紅軍改編為第八路軍，陝甘寧蘇區改稱陝甘寧邊區。蔣同意以中共黨員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9月22日，國民黨中央社播發〈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中共承認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所必須，取消暴動政策，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取消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名義，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領導，擔任抗日前線。中日戰爭的主戰場開始在華北，後來蔣發動淞滬會戰，主戰場轉

移華東，其原因之一在於吸引日軍主力，保衛從新疆經過隴海路的中蘇運輸線。

1941年11月7日，《蔣介石日記》云：「本日為俄國革命紀念日，余親赴俄使館慶祝，對俄顧問，本晚亦照常設宴禮遇，且觀劇助興。」當時，德軍入侵蘇聯，正重兵圍攻莫斯科，蘇聯處於最困難時期，蔣日記云：「然而我國於其被侵失敗之時，不惟不計較其既往，而且報之以道義，此為中華不畏、不侮立國之精神，不能使之喪失。」蔣雖視蘇聯為「赤色帝國主義」，但仍然努力維護同盟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世界分為兩個營壘。國民政府內部一派主張聯德，一派主張聯合英美。由於德軍曾在歐洲所向無敵，所以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和孫中山之子孫科都主張聯德。上世紀30年代，中德關係密切。蔣介石的軍事顧問是德國人，取得軍火的重要來源是德國。孔祥熙1936年遊歷歐洲，最大的成果是獲德國答應提供軍火。蘇聯之前，世界上唯一給中國提供軍火的是德國。1942年6月，德國人拉攏蔣介石政府簽訂《中德秘密軍事協定》，聯合進攻印度，與日軍會師印度洋。中德在瑞士談判，蔣「嚴令拒絕之」^⑨。蔣的決定，避免了中國在二戰後淪為戰敗國的命運。

二戰中，英美兩國的戰場一在歐洲，一在亞洲。英美打算先消滅德國，再對付日本。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英美對日宣戰，中國政府很快也對日宣戰，中、美、英、蘇等二十六國共同發表宣言，世界反法西斯陣營成立。1942年6月，中美簽訂了《抵抗侵略互助協定》。1943年10月，中、英、美、蘇簽訂

《普遍安全宣言》。此後，英美對中國的抗戰提供了經濟和軍事支援。

英國政府老奸巨猾，對日長期妥協、綏靖。中國駐英大使顧維鈞回憶說：「英國的政策就是在不損害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極力討好日本，而不惜犧牲別國的利益，特別是中國的利益。英國人企圖使日本不要在中國以外的地域打仗。」^⑩1939年，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Robert Craigie）和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東京談判，聲稱如日本不侵犯英國在遠東、香港和新加坡的利益，英國就支持日本。對此，蔣介石認為「其老奸巨猾市儉之手段與態度可惡，亦復可笑」^⑪。他公開發表演說，批評英國。

當時，日本需要鋼鐵、石油、銅、鉛等大量戰略物資，其中90%以上都向美國購買。抗戰爆發，蔣介石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要求對日封鎖和制裁。羅斯福宣布廢止《美日貿易協定》，凍結日本在美國的一億多美元儲備。日本為此和美國進行談判。1939年11月，羅斯福手書〈備忘錄〉，恢復對日經濟關係，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則提出《臨時過渡辦法》，修改凍結在美日資的命令，允許進口日本生絲。11月24日，蔣日記云：「接閱美國所擬對倭放鬆妥協之條件，痛憤之至。何美國愚懦至此？從此可知，帝國資本主義者惟有損人利己，毫無信義可言。」蔣所罵的「帝國資本主義者」，就是美國。同日，蔣致電駐美大使胡適，指責美國反覆無常：「從此國際信義與人類道德，亦不可復問矣。」「中〔正〕亦萬不信美國政府至今對日尚有如此之想像也。」^⑫26日，蔣再次致電胡適，要胡適轉達羅斯福：即時宣明與日決不妥協。

他並以舊事警告：「回憶往年，英德妥協，捷克、波蘭遭受無故犧牲之痛史，殷鑒不遠，能不惶悚！」^⑩

此外，蔣介石致電駐美代表宋子文：美如對日妥協，「中國四年半之抗戰」，「死傷無數之生命，遭受歷史以來空前未有之犧牲」，由於「美政府態度之曖昧猶疑」，給了日本「虛聲恫嚇」的宣傳機會，「以致中國抗戰功敗垂成」，「世界禍亂迄無底止」。蔣提醒並嚴重警告美國，「不知千秋歷史，將作如何記載矣！」^⑪蔣還將有關情況通知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邱吉爾認為，如中國戰場垮了，歐洲戰場的危險會大大增加。他在凌晨致電羅斯福，勸止其和日本妥協。羅斯福和國務卿赫爾決定不再對日本妥協，並提出強硬條件。12月1日，日本御前會議得出結論：「美國已經徹頭徹尾地成為蔣介石的代言人。」^⑫日本認為：依照美國的強硬條件，本國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盧溝橋事變的成果都將付之流水，決定對美國、英國、荷蘭開戰，裕仁天皇批准攻擊日期為12月8日。當日4點20分，日本代表向美國政府遞交最後通牒和向美英宣戰的天皇詔書，突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同日，美國、英國也對日本宣戰。

12月8日，蔣介石代表中國政府表示，將竭其全力與美、英、蘇及其他諸友邦共同作戰，以促成日本及軸心國家的完全失敗。蔣提出成立以美國為首的軍事同盟。10日，蔣致電宋子文，建議制訂中、美、英、荷四國聯合作戰計劃。31日晚，羅斯福約見宋子文，提出二十六個國家簽訂《聯合國家宣言》，英、美、蘇、中四強先行簽字。宋子文當即代表中國簽字。1942年1月1日，世界反法西斯

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中國的抗日戰爭，獲得世界更多國家的同情、聲援和支持。

中國軍隊對日作戰初期敗多勝少，除林彪指揮的平型關戰役和以桂軍為主力的台兒莊戰役外，1942年由薛岳指揮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殲滅日寇56,000餘人，被美國稱為同盟國在遠東戰場之大勝。當時中共領導的《新華日報》也肯定這是一次輝煌的勝利。緬北、滇西之戰從1943年10月打到1945年3月，前後十七個月。中國軍隊挺進2,400公里，收復緬北城鎮五十餘座，解放緬甸領土8萬平方公里，收復雲南西部失地8萬平方公里，殲滅日寇48,000餘人。

1937年的淞滬會戰失敗後，國民黨內主和派增多。12月15日，蔣介石召集國防會議：「主和主戰，意見雜出，而主和者尤多。」^⑬中央委員于右任當面批評蔣「優柔而非英明」^⑭。司法院院長居正此前就表示：「如無人敢簽字，彼願為之。」^⑮代理行政院院長孔祥熙也從「傾向和議」發展為「主和至力」^⑯。18日，蔣在日記中說：「近日各方人士與重要同志皆以為軍事失敗，非速求和不可，幾乎眾口一詞。」^⑰在「眾口」主和的情況下，蔣與于右任、居正談話：「今日最危之點在停戰言和。」其日記云：「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⑱這以後，中日之間有過多次秘密談判。孔祥熙所主持的談判確有妥協傾向，蔣曾嚴厲批評。1939年10月，日方以「去汪」為誘餌，企圖拉蔣坐到談判桌前，蔣致函孔祥熙說，「以後凡有以汪逆偽組織為詞而主與敵從速接洽者，應以漢奸論罪，殺無赦」^⑲。1940年3月，已被國民黨開除黨籍的汪精衛在南京建立傀儡政權。

1944年11月，日軍攻佔貴州軍事要地獨山，掃除進攻四川的障礙，重慶情勢危殆，駐渝使館紛紛準備撤離。美國人、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建議蔣介石遷都雲南昆明。蔣計劃固守烏江，等待主力部隊集中，再謀反攻，其日記稱：「若至最後絕望之時，乃堅守重慶，決與此城共存亡。」^③12月4日晨，魏德邁詢問遷離重慶的準備，蔣答稱：「此為中華民族歷史與民族志節關係，不能討論。余雖被敵在渝包圍，亦決不離渝。」魏德邁不以蔣死守重慶為然，蔣在當日日記中寫道：「彼並未了解中華民族殺身成仁之傳統精神也。」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蔣介石和羅斯福派到中國的代表談話，要求美國首先單方面主動廢除對華條約中的不平等條款。1941年12月31日，羅斯福提議組織中國戰區，推舉蔣介石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1942年1月31日，蔣在日記中寫道：「國家與個人之聲譽及地位，實為有史以來開空前唯一優勝之局也。」^④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別在華盛頓和重慶簽訂平等、互惠的新約，中國成為國際四強之一。

經過抗戰，鴉片戰爭以來的國恥洗雪了，東北、台灣、澎湖列島等丟掉的土地，隨着抗戰勝利，通通收回了。因此，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戰爭。

亞洲有幾個國家長期處於殖民地狀態。第一個大國是印度，它是英國的殖民地，國民大會黨領袖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要求印度獨立。蔣介石支持尼赫魯和提倡不合作主義的甘地(Mahatma Gandhi)。1942年，蔣和宋美齡一起訪問印度，會見尼赫

魯和甘地，企圖化解印度和英國的矛盾，鼓勵印度站到國際反法西斯陣營方面。

1910年，日本吞併韓國，大量韓國愛國者流亡中國，將中國作為反日基地。蔣介石將協助韓國獨立看作是中國抗戰的目標之一，協助其組織光復軍和義勇隊。羅斯福認為韓國久為日本殖民地，提出戰後先由中、美、英、蘇四國共管，蔣則主張戰後韓國應馬上獨立。中國政府在抗戰勝利後即用飛機將他們的領袖金九送回漢城。

越南長期是法國殖民地。羅斯福極度不滿於法國政府在二戰中的表現，在開羅會議上表示，戰後將越南贈給中國。蔣介石表示，越南從來不是中國的領土，戰後一定要讓其獨立。羅斯福對此不理解，在德黑蘭會議上向蘇聯領袖斯大林講述他的困惑，斯大林表示同感。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是抗擊日本唯一戰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日本在中國的陸軍一度佔其陸軍總數的78%，最高峰時佔94%。二戰戰區達2,200萬平方公里，中國戰區達600萬平方公里。德、日、意的法西斯軍隊共1,100萬人，中國抗擊了其中的240萬人。從抗戰時間上看，美國三年九個月，英國六個月，但中國的抗戰長達十四年。

中國戰場拖住了日本北進的腳步，使蘇聯避免陷於兩面作戰，集中力量對付德國。從1941年春到1944年秋，蘇聯先後從遠東調集54萬人、5,000門大炮、33,000多輛坦克到歐洲戰場。而且，中國戰場牽制日軍兵力，阻滯其進犯東南亞的計劃，為美國贏得時間，也為美國空軍轟炸日本提供後方基地。由於中國戰場的存在，粉碎了德、日、意在中東會師的

計劃。羅斯福說：「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歐洲，打下印度」，「可以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割吞埃及，斬斷通過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⑳。所以說，中國戰場的存在有力地保證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1943年1月25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明確肯定蔣介石「在抗戰中有功勞」^㉑。1991年，鄧小平題寫書名、胡喬木撰寫〈題記〉、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稱：「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承認第二次國共合作，實行抗日戰爭，是對國家民族立了一個大功。」^㉒

第三大功：建設台灣，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獨。蔣介石在1947年就想：美霸道，英專制，應以民生主義立國。他退到台灣後反省，要求國民黨人「知恥」，表示將努力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㉓。

針對國民黨人長期知行脫節的痼疾，蔣介石認為，「行」才能創造一切，重提「力行哲學」。1949年10月，蔣不避抄襲毛澤東的嫌疑，在台北成立革命實踐研究院，自任院長，其任務為研討軍事、政治、黨務的改革方案。他在開學演講中要求學員「檢討過去的錯誤，反省過去的罪過，了解我們過去失敗的原因」^㉔。為此，他積極推行「革命實踐運動」，先後起草〈革命實踐運動草案〉和〈革命實踐運動綱要〉。蔣將軍官訓練團改名實踐學社，將中央黨部禮堂改名實踐堂。同年12月，蔣介石萌生改造國民黨、「從新組黨」的想法。1950年7月，他親自擬訂中央改造委員會的名單。

1952年7月，召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國民黨的性質為「科學的革命民主政黨」。後來，蔣並推行國民黨改造運動。

蔣介石退到台灣以後，一直宣稱反攻大陸，但在事實上則將其中心任務轉變為改造台灣、建設台灣。其中最重要、影響最大的舉措是土地改革。陳誠是蔣的心腹愛將，1948年12月就任台灣省主席後，首先實行「三七五減租」，於1952年實行土改，至1953年基本完成。台灣地主交出多餘的土地，當局用國營公司的股票交換，共徵收地主私有土地143,000餘甲（甲，約14.5市畝），佔出租耕地面積的56%，承領佃農194,000餘戶，佔佃農總數的80%。農民自承領之日起，分十年以實物或土地債券繳清地價。大量農民由此獲得土地，自耕農成為台灣農民的主體。自1952至1968年，台灣農業產量增加1.2倍。不少地主變為工商業主。陳誠稱台灣土改是一次「不流一滴血的革命」。1967年5月，西德著名電視影片發行人沙赫（Schah）認為，台灣人的生活水平「已躍居亞洲第二，僅次於日本」。1969年，台灣已成世界「十大工業地區」之一，與韓國、新加坡等並稱「亞洲四小龍」。1972年，其經濟成長率已成為「亞洲最快最高之一」^㉕。晚年，蔣愧悔過去未注意科學，提出科學第一，教育優先，以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處理問題；還舉行縣市選舉，成為台灣堅持多年的政治舉措。

蔣介石退到台灣以後，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反對所謂台灣獨立活動。1948年，台灣雲林縣人廖文毅在香港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以英文發表〈台灣的聲音〉（“Formosa

Speaks”），聲稱「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血統」已經「脫離」。1950年，廖將該聯盟遷到日本，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1955年9月，成立「台灣臨時國民議會」。11月，台灣臨時國民議會通過《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組織條例》。12月，廖被選為「大總統」。1956年2月28日，廖在東京召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酒會，發布《獨立宣言》。9月1日，公布《臨時憲法》。

還在1951年，台灣國民黨當局就在東京成立「工作組」，任務之一為遏制廖文毅的活動。1956年1月，台灣當局派人與日本外務省交涉，任務同前。蔣介石指示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與日方交涉，指責台灣民主獨立黨為「叛亂組織」，要求取締。1957年1月14日，台灣當局外交部次長沈昌煥向日方要求，將廖等逮捕送台，以軍法審判。1961年，廖計劃到美國活動，蔣接見美駐台使節，提出嚴重警告，後來並為此取消訪美計劃。1965年5月14日，廖飛返台北，聲明放棄台灣獨立組織與活動。16日，回鄉祭掃祖墳。7月2日，蔣親自接見，予以鼓勵。12月，任命廖為曾文水庫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負責實際責任。此後，廖即放棄台獨活動。1986年5月去世。

至於蔣介石的三大過，包括：

第一大過：1927至1937年的十年殘酷「剿共」。「四一二政變」後，國共統一戰線破裂，中共轉入農村，進行土地革命，在江西、湖南、廣東、福建等省的三十一縣，約1,910萬人口的地區建立蘇維埃政權，打土豪、分田地，軍事上和國民黨政權對立，以推翻其統治為目的。國民黨則實行「圍剿」。1931年8月16日，蔣介石手

令國民黨軍官趙觀濤和衛立煌二人：「大小各村莊務全燒毀，勿遺。」^{②1}21日，蔣下令熊式輝分割區域，用「火油」焚燒「匪巢」，「每區約焚二三日」^{②2}。1933年8月30日，蔣密電潢川和沙市的國軍負責人「剷除匪根」。他惡狠狠地解釋道：「推『剿匪』之『剿』字，其意義亦必以刀入匪巢、殺戮盡淨之意。」^{②3}據不完全統計，僅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被殺害者即達310,000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000多人。

蔣介石對位於江西省的中央蘇區的大規模「圍剿」，多達五次^{②4}。至1937年9月6日，中共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改名為陝甘寧邊區政府，蔣對各地蘇區的「圍剿」長達九年十個月。

第二大過：1946至1949年的三年反共內戰。抗戰勝利，國內普遍希望和平。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於1945年8月28日赴重慶談判。10月10日，雙方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1946年1月5日，國民黨、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民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代表在重慶舉行政治協商會議，達成《和平建國綱領》等五項協定。5月，蔣悍然向中共解放區進攻，三年反共內戰爆發。這段時期，國民黨軍隊戰死171萬人，傷36萬人；中共軍隊犧牲136萬人，傷28萬人。

第三大過：退到台灣後的反共「白色恐怖」。為了鞏固統治，自1949年5月19日，蔣介石在台灣全島宣布戒嚴，至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國民黨在台灣各地肆意逮捕、屠戮人民，位於台東東方海中的綠島成為關押「政治犯」的集中營。三十八年中，台灣當局軍法審判案件計29,407件，

受難者14萬人。其中不知道有多少無辜百姓！

三 蔣介石的思想、性格特徵

人的行為受思想指導。蔣介石的思想複雜，因此形成多重性格特徵。

(一) 民族主義者：維護國家主權，期望民族振興

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抗日是蔣介石作為民族主義者最典型和最集中的表現。此外，還表現在保衛新疆和西藏主權等問題上。

1933年，盛世才依靠蘇聯力量上台，成為新疆臨時邊防督辦。他親蘇、附蘇。1938年，在莫斯科加入蘇共。1941年，向蘇聯建議成立「新疆蘇維埃共和國」，「加盟蘇聯」。1942年3月，盛世才的四弟盛世騏被暗殺，盛派其五弟盛世驥到重慶，商談新疆歸附中央。蔣介石決定將新疆劃為中國第八戰區，任命盛世才為戰區副司令長官。8月末，蔣派宋美齡攜自己手書赴新疆，與盛世才商談國軍進入新疆、籌備設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等問題，並達成協議。同時，國民政府主持邊疆政治的大員吳忠信也與盛世才長談，告以「中央對新絕對信任」³⁵。9月，蔣介石吸收盛世才加入國民黨。1943年7月，任命其為省黨部主任委員。9月，蔣派機接盛世才到重慶參加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有過一定離心傾向的雲南省主席龍雲亦同時到會，蔣視為「民國以來未有之盛事」³⁶。1944年9月，蔣內調盛世才到重慶擔任國民政府農林部長，親自授印。蔣認為「新疆問題完全解決」³⁷，

成為蘇聯領土的危險從此消除，其1942年年末所寫之〈總反省錄〉云：「蘭州以西直達伊犁，直徑三千公里之領土全部收復，此為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最大之成功，其面積實倍於東北三省也。」他認為，從此「抗戰之後方完全鞏固，日本更不能再有消滅我政府之妄圖」，「此非上帝賜予中華民族之恩澤，決不至此也」³⁸。

英國長期覬覦西藏，懷有野心。1943年5月，在華盛頓的太平洋會議上，邱吉爾突然發言：「近聞中國有集中隊伍，準備進攻西藏之說，使該獨立國家大為恐慌，希望中國政府能保證不致有不幸事件發生。」³⁹宋子文立即反駁，並向蔣介石匯報。蔣於5月23日回電：「西藏為中國領土，藏事為中國內政，今邱相如此出言，無異於干涉中國內政，是即首先破壞《大西洋憲章》，必堅決反對並難忽視。」⁴⁰其同日日記云：「此誠帝國主義真面目暴露，不僅為流氓、市儈所不為，而亦為軸心倭寇所不齒。」

抗戰中，羅斯福派史迪威 (Joseph W. Stilwell) 將軍到中國任戰區參謀長和總統代表。1944年，羅斯福要求蔣介石將中國軍隊的指揮權全部交給史迪威，蔣拒絕，一度準備放棄美援，與美絕交，獨立抗日。他要求美國撤回史迪威。羅斯福不願失去中國這一戰略夥伴，同意撤回。蔣認為，這是「中國解放之開始」⁴¹。

自1949至1975年，蔣介石在台灣和美國打了二十六年交道。他既依靠美國維護台灣政權，又認為美國視中國為「家犬」、「門犬」，不願完全受美國控制，力圖保持警戒。蔣這一時期的日記對美常有指斥。如：

1951年7月11日：「美國乃無正義之國。」

1951年8月2日：「美國非中國之友人，而為中國之主人。」

1953年7月10日：「若與之合作，只有被其陷害與犧牲而已。」

1967年8月16日：宋美齡企圖赴美弔孔祥熙之喪：「余以美土，不願我家人常踏。」
以上種種，都是其民族主義思想感情的流露。

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性格還表現在他不願對大陸使用原子彈等問題上。1950年，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主張對中國使用原子彈，蔣提出「設法破之」。1954年，美國空軍部門向台灣空軍總司令王叔銘表示，可提供「原子武器」，蔣認為此舉「對於民心將有不利之影響」。1964年，美國國務卿魯斯克(David Rusk)訪台，表示將以原子彈解決戰爭，蔣認為對環境污染太大。1968年，魯斯克舊話重提，蔣憤然表示：「你們永遠不應設想以核武器對付中國！」^④

1968至1971年，蔣介石計劃聯合蘇聯，進攻大陸。當時台灣駐墨西哥大使陳質平與蘇聯大使，台灣新聞局局長魏景蒙與蘇聯克格勃(KGB)人員、英國記者路易士(Victor Louis)在台灣和歐洲談判，研究進攻大陸計劃。蘇聯表示可以借錢、借武器、借基地給台灣當局。1969年，中蘇兩軍在珍寶島發生戰鬥，蔣決定不介入。12月29日日記云：「我政府自當靜觀其內部變化，決不在此時反攻，以免俄共侵佔華北。」

(二)改良主義者

蔣介石早年曾主張「殺光資本家」，後來轉向溫和路線。在土地問題上，蔣主張減租，通過土地銀行借

錢給農民購地，和平土改，使地主不受損失。在資本問題上，蔣主張實行「社會資本主義」，其內容為：生產為主，平均分配；控制大資本；實行勞資合作。1939年3月，蔣在重慶南溫泉辦訓練班，進行問卷調查，第一天提出十一個問題，要受訓學員回答，如：「本黨黨務為何如此消沉、疲弱而不能及時振作、健全？」「本黨黨務何以不能發展？何以二等以上人才不肯參加本黨？」「本黨為何不能與共黨抗爭？一切組織、宣傳、訓練，皆比不上共黨？」「本黨黨員為何不肯深入民眾作基層工作，刻苦耐勞？」「為何黨委變成官僚？」「為何民眾不信仰本黨與黨員？」第二天又提出三個問題：「本黨為何不能掌握青年？」「一般大學教員為何要反本黨？」「為何黨政不能打成一片？」^⑤從提出的這些問題看，蔣承認中共的優長之處，對國民黨的腐敗、脫離人民、受到人民反對的嚴重情況有所認識，他敢於將這些問題提交黨內討論，甚至寫出書面意見，說明他確有改革企圖。當時，蔣曾設想將黨名改為勞動國民黨，本人為「勞農」、軍人或「為社會服役者」才可以成為黨員^⑥。他還曾計劃培養十萬革命幹部，每人須下鄉三年，為農民服務；又曾設想，讓軍隊為農民種地。不過，這些都是空想，並未實施。

1949年1月下旬，蔣介石在溪口表示本黨須「徹底改造」。7月18日，蔣向國民黨中常會提交〈改造綱要〉^⑦。12月，蔣有過「徹底解散」國民黨、「從新組黨」的想法。1950年，蔣在排除陳立夫的CC系及桂系人員之後，曾計劃於10月11日召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企圖清除「腐化惡化份子」，實行年輕化、精幹化。

(三) 中國傳統文化、基督教義與孫中山思想的崇拜者

蔣介石愛好儒學，推崇《易經》和宋明道學，特別推崇王陽明、曾國藩與胡林翼三人的著作。早年，蔣有過一段「日讀曾文正書」的日子，1930年代，積極提倡王學。其日記稱：「今日看《陽明集》，認此為救國之本，當提倡之。」^④晚年，受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影響，推崇明末清初的顏元、李塨學派，譽為「漢唐以來罕有之大儒」，曾檢討說：「幾乎為程、朱、陸、王之學誤此一生。」^⑤

1930年10月24日，蔣介石在上海受洗禮，日記云：「三民主義為余政治行動之信仰，耶穌教義乃余精神唯一之信仰。從此以後，以基督為余模範，救人救己，永矢勿忘。」

蔣介石一生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相標榜，稱其為盡善盡美、獨一無二的主義^⑥。

(四) 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者

國共合作時期，蔣介石不贊成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1926年5月16日，蔣介石會見蘇聯顧問鮑羅廷(Mikhail Borodin)，「以兩黨革命，小黨勝於大黨為憂，又以革命不專制不能成功為憂」^⑦。他提倡「一個黨、一個主義」，要求已經參加國民黨的中共黨員退出中共，做單純的國民黨員。抗戰初期，兩黨談判合作抗日，蔣提出「編共」，企圖將共產黨的組織和軍隊都「編」入國民黨。1938年2月，兩黨商量建立國民革命同盟會，蔣命邵力子與周恩來商談，催促共產黨併入國民黨。10日，蔣與周當面談話，要求兩黨合併，聲

稱「要革命成功，就只能有一個黨，一個團體」^⑧。12月6日，蔣再次對周說：「中共既行三民主義，最好合成一個組織。」他表示：「如果此點可談……擬約毛澤東面談。」^⑨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制訂「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四項方針，通過由蔣親自提出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自此，國共兩黨雖聲稱合作抗日而矛盾日多。蔣害怕民主，強調「未至實行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就會發生「一發而不可收拾」的情況。抗戰勝利後，蔣曾經模仿美國，於1948年召開「行憲國大」，制訂憲法，選舉總統、副總統，但其模仿的結論卻是：「其利未見而危害實已非淺」，甚至說：「所謂民主與憲政，其害國之大，竟如此也。」^⑩他始終神往於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個人專制、獨裁統治。

1944年，羅斯福派好友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赴華，調解國共關係，希望兩黨團結抗日。赫爾利到延安，與毛澤東達成《延安協定》：(1) 兩黨共同工作，統一軍事力量抗日。(2) 改組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使之成為包括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聯合國民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3) 實行促進進步與民主的新政策，維護思想、出版、言論、人身、居住自由，免除威脅、貧困。(4) 承認所有抗日軍隊，公平分配聯合國物資。(5) 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所有抗日黨派的地位^⑪。羅斯福贊同《延安協定》，毛澤東也表示滿意，當即揮毫簽字。但是，當赫爾利將該協定攜回重慶時，蔣介石卻指責其「糊塗失察」，視為對政府的「最大之打擊」和「共匪詭計最大之成就」。他與王世杰等提出《協定修正案》三條，絕口不

提聯合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只同意在有關機構中給予中共席位，相反，卻要求中共軍隊接受「整編」，列為「正規國軍」。對此，毛批示道：「黨治不動，請幾個客，限制我軍。」^{⑤4}他批評蔣的《協定修正案》是要中共「完全投降」，大發雷霆說：「如果蔣介石在這裏，我要當面痛罵他。」又說：「他早就該下台了！」^{⑤5}

同年11月20日，國民黨在國內外壓力下，決定局部改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宋子文旋即出任代理行政院長。赫爾利認為國民黨向自由和民主前進了一步，周恩來回信稱：只有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才能使中國向着民主走進一步」^{⑤6}。12月，周要求國民黨先行釋放全國政治犯，撤退包圍邊區的國軍。毛澤東則提出，先行在重慶召開國、共、民盟三方國事會議。

為敷衍輿論，蔣介石於1945年1月表示，將立即使政府自由化和淨化，成立戰時內閣，邀請共產黨參加。周恩來則提出，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蔣召見周，指稱周提出的「黨派會議」等於「分贓會議」，「聯合政府」無異「推翻政府」^{⑤7}。孫中山生前有過「還政於民」的說法，蔣聲稱只能「還政」於將來的國民大會。1935年11月國民黨曾決定次年召開國民大會，已選代表874名，未選326名。中共視之為曹錕賄選時期的「豬仔議員」^{⑤8}，否認其合法性，而國民黨則維護其合法性。雙方衝突，周於1945年2月憤而離開重慶，返回延安。

1945年5月，國民黨決定於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並頒布憲法。7月4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中共參政

員拒絕出席。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社論，批判蔣介石粉飾「獨裁統治」，指責赫爾利「變卦」，「背叛了他在延安時所說的話」，使蔣「變成了美人」^{⑤9}。

蔣介石之所以反對聯合政府，原因在於：第一，不願改變國民黨長期以來形成的「一黨專政」的政治結構；第二，長期的懼共、反共心理，認為中共「插進一個腳趾，就會全身擠進來」^{⑥0}。

（五）以個人為中心的威權主義者

古有「天之降大任於斯人」的說法，蔣介石認為自己就是這樣的「斯人」。他以「基督化身」和「太極」自居，極度自我迷信。一身兼職八十二個，大大小小，甚麼事都管。例如，重慶的垃圾堆設置何處、婦女的髮長不得超過四寸、宣傳部部長吃飯時的「吃相」、中山樓貴賓室的陳設，以至報告提綱應該放在中山裝的哪一個口袋等問題，都要親自管控。蔣的思想邏輯是「三段論」：一、我蔣介石是革命者；二、你反對我蔣介石；三、自然，你就是反革命。蔣在處理事務時，常常依據這樣的「三段論」。

（六）長期不斷的反省者

蔣介石思想性格有許多毛病，如好色、暴躁、多疑、孤僻、自戀等，但他以「古往今來第一聖賢豪傑」、「中華民國模範」自期，不斷反省、「鬥私」。他的日記每周、每月都有〈反省記〉，如「見色起意，記過一次」、「遇豔心不正，記大過一次」之類。年終，甚至有成千上萬字的〈本年反省記〉。

應該承認，蔣介石本人不貪污、對子女也要求較嚴格。1947年10月，當國民黨的「接受大員」到淪陷區搶奪金子、銀子、房子、車子、女子

時，蔣發現蔣緯國也在上海「接受」了一座房子，批評其「招搖不軌，不知自愛，為人輕視，為家庭羞」，命蔣經國代為「教誡」。24日，又命其將房產退還敵產管理處^⑥。1966年7月7日，蔣孝文借敞篷車往日月潭度蜜月，蔣介石命該車立即回程。日記云：「恐其招搖遊逸，為世詬病，且不能成材也。」

蔣介石也有一些正確或較正確的思想。1923年9月訪蘇期間，蔣和共產國際領袖季諾維也夫(Grigori Zinovyev)辯論。季諾維也夫認為中國革命不僅要沒收外國資本，也要沒收本國資本，蔣則提出「兩步走」，首先解決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然後才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問題。

蔣介石訪問蘇聯時，閱讀《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傳》、《馬克思學說概要》和德國社會主義運動史等書，曾經讀到「倦不掩卷」、「樂而不能懸卷」的地步^⑦。有人動員蔣參加中共，蔣辭以「須請命孫先生」^⑧。

蔣介石很快與馬克思主義背向而行。「愛人」與「恨人」，蔣宣稱「博愛救世」，選擇「愛人」；階級鬥爭與階級合作，蔣選擇階級合作；全民利益與無產階級利益，蔣宣稱代表全民利益而實際代表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蔣一度欣賞辯證法：1938年12月7日日記云：「革命鬥爭而不知辯證法方法論，如何能不失敗呢？」其1925年11月12日日記稱：「泰戈爾以無限與不朽為人生觀之基點，又以愛與快樂為宇宙活動之意義。列寧以權力與鬥爭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以唯心，一以唯物。以哲學言，則吾重精神也。」這說明他是一個唯心主義者。

1937年蔣介石開辦廬山軍官訓練團，要求學員「為國家犧牲」、「為

人民服務」^⑨。事實證明，那只是官話、套話、空話而已。

四 蔣介石為何丟掉大陸

蔣介石為何丟掉大陸？原因很多，主要有：一、發動內戰，軍事失敗；二、拋棄「二五減租」，土改成為紙上空談，導致失去農民支持；三、國家壟斷資本和官僚資本膨脹，私人資本被壓縮、排擠，失去民族資產階級支持；四、經濟政策失誤，物價飛漲，導致全民不滿；五、一黨專政，個人獨裁；六、包庇孔氏家族的貪污腐敗，失去民心。關於這一點，下文還將闡述。

1945年11月28日，魏德邁會見蔣介石，報告他所知中央派往華北官員的貪污情況。29日，蔣日記云：「聞之慚惶無地，不知所止。」1947年8月10日，魏德邁向蔣遞交提綱，列舉應該改革的方面，其中特別提到「清除貪污無能官員」。17日，蔣在日記中寫下「掃除貪污，提高監察權與民意檢舉權」等字。18日，寫下「貪污富豪應除黨籍」等字。19日日記提到，魏德邁在南京與蔣長談，從上午10點一直談到下午4點，蔣向魏德邁保證，「他是真心要幫助他的人民，消除腐敗」。魏德邁則稱，「改革已刻不容緩」。22日，蔣日記云：「本日魏德邁對我首腦部之談話，無異嚴厲之訓詞，類於斥責裁判，實為我國最大之恥辱」，「若不痛自反省，發奮雪恥，何以立國？何以成人？」這一天，蔣決定籌組偵察貪污與軍紀的機構，設立軍法總監與各路軍法機構，還決定在憲兵中增編「特偵貪污隊」。

1945年12月2日，蔣介石決定告誡黨政軍各界官吏：「廉潔自愛，奉公守法。」5日，審核〈肅清貪污運動綱領〉及〈改革黨務方案〉，聲稱這兩個文件「極為重要」⁶⁵，同時計劃成立「肅清貪污運動之組織」。他在日記中提出，要「忍痛斷臂與除毒，祛除情感」，甚至提出要「提倡民主法則，加強群眾監督力量，滌蕩官僚惡習與剷除豪門資本」這樣的高難度要求⁶⁶。為了反對貪污，1947年9月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當前組織綱領》，規定黨員、團員一律重新登記，黨員財產必須依規定申報，凡有貪污行為者、拒絕登記財產者，均不得成為黨員；貪污有據者，開除黨籍。

1942年12月21日，蔣介石召見侍從室邱清泉、陶希聖等人，批評邱等所擬懲罰舞弊案的決定不當，要求將林世良改判死刑，許性初改判徒刑五年，不許緩刑。當晚日記云：「非此不足以昭信與立國，庸之只知包庇所部，而不知政治與法律之重要。」庸之，就是孔祥熙。蔣在其12月26日的〈上星期反省錄〉中寫道：「林世良與許性初案，依法懲治，不為權勢所亂，此事雖小，實為以後祛除貪污，修明政治最大之關鍵。」這裏的「權勢」仍指孔祥熙。林世良時任中央信託局運輸經理，是孔祥熙長子孔令侃的親信、孔二小姐孔令俊的未婚夫。1945年8月16日，蔣再次在日記中指責孔祥熙：「檢討中央銀行美債案，處置全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長夢多，授人口實。惟庸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像也。」儘管孔祥熙貪瀆嚴重，但蔣仍力圖保護。

1948年，蔣介石派蔣經國到上海查處貪官和奸商（俗稱「打虎」），發現孔令侃開辦的揚子公司犯有「囤積案」，蔣經國下令查封倉庫，準備

抓捕孔令侃，監察院並要求立案檢查。宋美齡緊急報告蔣介石。10月18日，蔣致電上海市長吳國楨稱：「該公司為商營而非政府機關，該院不應對商營事業無理取鬧。如果屬實，可囑令僱聘律師進行法律解決，先詳討其監察委員此舉是否合法，是否有權，一面由所律師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動，拒絕其檢查。並以此意，約經國切商，勿使任何商民無辜受屈也。」⁶⁷然而，蔣介石、宋美齡包庇孔令侃的情節迅速流傳、發酵。蔣介石、蔣經國和宋美齡都受到社會人士包括國民黨內部的廣泛批評。當時守衛北平的國民黨將領傅作義對另一將領杜聿明說：「蔣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們還給他幹甚麼！」此事成為傅對蔣「失去信仰」的重要原因⁶⁸。蔣經國部下將領賈亦斌在向蔣經國勸諫不成後也極為失望，「決心同蔣家王朝決裂，同蔣經國分道揚鑣」⁶⁹。

1948年11月4日，《中央日報》發表殷海光執筆的社論〈趕快收拾人心〉，批判「享有特權的人享有特權，人民莫可如何」，「豪門之輩，不是逍遙海外，即是依勢豪強如故」。事後，孔祥熙逍遙美國，揚子公司被查封，孔令侃也經過香港，去了美國。社論指認「豪門」為「人民公敵」，斥責國民黨和政府「甚至不曾用指甲輕輕彈他們一下」，又說：「革命與反革命的試金石，就看是走多數派的路線，還是走少數派的路線。如果走少數派的路線，只顧全少數人的利益權勢，那末儘管口裏喊革命，事實上是反革命。」⁷⁰

檢視蔣介石槍斃孔祥熙親信林世良等事例，應該承認，蔣有反貪之願，曾屢立名義，更換方案，但終未奏效，最後丟失大陸，敗走台灣。

五 毛澤東聯蔣反美及蔣經國與中共秘密談判

1958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自海外歸來的記者曹聚仁，對當時在場的周恩來、李濟深、章士釗等人說：「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同他合作。」又說：「蔣介石為甚麼不再做總統？我們都是『擁蔣派』，問題是美國要整他」，還說：「讓他們在那裏搞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天天吹反共，我們也天天吹收復，商量好。」說到這裏，毛突然改變口氣，直接對蔣說：「可以搞你那一套。」「不同美國搞在一起，就是偉大勝利。」^①

1965年7月18日，蔣經國乘船到香港水域，將曹聚仁接到台灣。20日，蔣介石與曹在日月潭涵碧樓會晤。曹出示中共中央信函，內附毛澤東寫給蔣的《臨江仙》詞，中有「明月依然在，何時彩雲歸」之語。雙方達成六項協定：(1) 蔣介石偕舊部回到中國大陸，可以居住在浙江以外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中共將撥出江西廬山地區作為蔣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封地)。(2) 蔣經國任台灣省長，除軍事與外交權外，其他政務由台灣省政府全權處理。(3) 台灣不得接受美國軍事經濟援助，若台灣財政有困難，北京將根據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4) 台灣海空軍併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三個師駐守台灣本島，一個師駐守金門與廈門地區。(5) 金門與廈門合併為一自由市，作為台北與北京之間的緩衝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台北徵求北京同意後任命。(6) 台灣現任文武百官官階與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水平只可提高，不能降低。六條協

議既然議妥，只待簽字。然而，此後文革爆發，即無下文^②。

1987年3月14日，在香港經商、與蔣經國有密切關係的沈誠受邀訪問大陸，又受楊尚昆之託，帶信給蔣經國，中稱：「祖國統一，民族振興，誠我中華民族之崇高願望，亦歷史賦予國共兩黨之神聖使命。對此，我黨主張通過兩黨平等談判而謀其實現。今自沈君得悉，先生高瞻遠矚，吾人深為讚歎！惟願能早日付諸實施，使統一大業能在你我這一代人手中完成。」^③函中，楊代表中共中央邀請國民黨派出負責代表進行初步協商。30日，沈到台北，將函件交給蔣經國。9月中，沈探望蔣經國病情。他說：「我正在研究他們來的那封信的處理問題。信已經給老夫人看過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作決策。」17日，沈和蔣經國討論赴大陸的代表。蔣經國稱：「第一波去北平的時間，定在明年2月底至4月初這一段時期。因為我也可能在明年三月召開本黨『十三大』時，在黨內秘密通過一下。」^④10月初及11月7日，蔣經國兩次召見沈稱：「去北平的人選，大概在下個月初的『黨中常委』中決定。」據沈記載：蔣經國「精神很差」，「顯得浮腫」，「音調低沉」。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

對蔣經國的去世，賈亦斌感到突然。他寫《哭經國兄》詩「泣輓」云：「萍水相逢知遇深，驟聞噩耗淚沾襟。難忘報國從軍志，時憶軫民建設心。開放探親贏盛譽，嚴防台獨最傷神。知兄此去留遺憾，尚有餘篇惜未成。」^⑤

賈亦斌曾任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領導人，自始至終參加接待沈誠的活動，和我相熟，知道我研究中國國民黨史。2004年12月7日，他告

訴我：沈到大陸，鄧小平同志提出過一個台灣回歸，國家統一的方案，通過沈傳達給蔣經國，蔣經國同意，表示說：「我不是為了做官，是為了對民族負責。」賈認為，如果蔣經國不去世，兩岸的統一就不是大問題了^⑥。

2015年3月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從根本上說，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的發展進步，我們要保證自身發展勢頭，同時採取正確措施做好台灣工作。」^⑦個人認為，正確研究、評價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歷史，是做好台灣工作、做好統戰工作的一部分。蔣介石的研究，須充分掌握資料，長期貫徹百家爭鳴方針。古人云「蓋棺論定」，蔣介石去世快五十年了，但是，蔣的歷史定位，也就是他的功過是非問題，尚待研究，須長期討論、商榷。

註釋

① 參見楊天石：〈中國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及其日記解讀》，第三卷（香港：三聯書店，2022），頁204-205。

②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82，1937年7月20日。

③⑦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頁79，1937年7月18日。

④ 〈胡適條陳〉手稿、〈陶希聖致陳布雷函〉附件，參見楊天石：〈胡適曾提議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近世名人未刊函電過眼錄〉，載《抗戰與戰後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32。

⑤ 〈對於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載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四卷（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頁582-85。

⑥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7年7月19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檔案館。本文所引蔣日記如無具體時間，均加註；有具體時間者，不註。

⑧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27日。

⑨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42年6月18日。

⑩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37。

⑪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39年7月26日。

⑫⑬⑭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四十七卷（台北：國史館，2010），頁500；524-26；508。

⑮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1840-1945）》，下卷（東京：原書房，1988），頁564。

⑯ 王宇高、王宇正編：《困勉記》（台北：世界大同文創有限公司，2021），頁591，1937年12月15日。

⑰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37年12月27日。

⑱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一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144，1937年11月21日。

⑲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一冊，頁147、157，1937年12月2日、27日。

⑳ 蔣介石：〈本周反省錄〉，《蔣介石日記》，1937年12月18日。

㉑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38年1月2日。

㉒ 「蔣中正電孔祥熙，以後凡有以汪兆銘政權為詞而主與日本接洽者，以漢奸論罪」（1939年10月9日），〈革命文獻——偽組織動態〉，《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台北），002-020300-00003-031。

㉓ 蔣介石：〈上星期反省錄〉，《蔣介石日記》，1944年12月2日。

㉔ 蔣介石：〈本月反省錄〉，《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31日。

㉕ 羅斯福（Elliott Roosevelt）著，李嘉譯：《羅斯福見聞秘錄》（上海：新群出版社，1949），頁42。

⑳ 毛澤東：〈對戰後形勢的分析和關於當前工作問題的指示〉，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四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14。

㉑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精裝本（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169-70。

㉒ 參見楊天石：〈台灣時期蔣介石的思想變化及其「革新」實踐〉，《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7年8月號，頁33。

㉓ 蔣介石：〈革命·實踐·研究三個名詞的意義和我們革命失敗的原因〉，載《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二十三卷，頁24。

㉔ 蔣介石：〈忠告世人勿避免一時的戰爭威脅而犧牲自由〉，載《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九卷，頁338；〈對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開幕典禮致詞〉，載《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二十九卷，頁533。

㉕ 「蔣中正電趙觀濤、衛立煌，共軍主力已由君埠西逃，可派主力部隊暫駐黃陂等」（1931年8月16日），〈革命文獻——剿共（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002-020200-00011-138。

㉖ 「蔣中正電示熊式輝，派飛機散布火油，令各部準備備焚燒共巢」（1931年8月21日），〈籌筆——統一時期（六十）〉，《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002-010200-00060-038。

㉗ 「蔣中正電示劉鎮華、徐源泉，匪化已深區域務令各部燒殺盡淨」（1933年8月30日），〈籌筆——統一時期（九十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002-010200-00092-027。

㉘ 參見楊天石：〈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五次「圍剿」〉，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第二卷，頁86-98。

㉙ 吳忠信：〈主持新疆工作日記〉，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三編，政治（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頁313、331。

㉚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43年9月4日。

㉛ 蔣介石：〈上周反省錄〉，《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23日。

㉜ 蔣介石：〈自記三十一年總反省錄〉，《蔣介石日記》，1942年12月31日。

㉝ 〈外交部長宋子文自華盛頓呈蔣委員長報告在太平洋會議與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商談關於增進對華空運及請英、美執行攻緬之決議等問題之談話情形電〉（1943年5月21日），載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第三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頁233。

㉞ 〈委員長來電〉（1943年5月23日），宋子文檔，61-2，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檔案館。

㉟ 蔣介石：〈本月反省錄〉，《蔣介石日記》，1944年10月31日。

㊱ Dean Rusk, *As I Saw I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90), 288；楊天石：〈蔣介石反對用原子彈襲擊中國大陸〉，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第五卷，頁52-57。

㊲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39年3月2日、3日。

㊳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42年10月14日。

㊴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台北：國史館，2015），頁323。

㊵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31年8月31日。

㊶ 參見楊天石：〈蔣介石與宋明理學〉，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第五卷，頁394-411。

㊷ 蔣介石：〈對於聯俄問題的意見〉，載《蔣校長演講集》（上海：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宣傳科，1927），頁5。

㊸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26年5月16日。

㊹ 邵銘煌：〈寒天國共對話——蔣中正委員長與周恩來武漢談話記錄〉，《近代中國》（台北），第161期（2005年6月），頁190。

㊺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436。

⑤②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48年9月17日、1949年9月8日。

⑤③ 國史館櫥窗陳列英文原件。

⑤④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561。

⑤⑤ 〈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包瑞德與毛澤東談話紀要〉(1944年12月10日)，載重慶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中共重慶市委黨校、紅岩革命紀念館編：《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下卷(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頁451。

⑤⑥ 「周恩來函赫爾利，中共堅持五條協定，中國國民黨竟加拒絕，致談判無結果」(1944年12月16日)，〈革命文獻——國共協商與共軍叛亂〉，《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002-20400-00003-029；又見〈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致國務卿〉(1945年2月7日)，載《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下卷，頁423。

⑤⑦ 黃炎培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黃炎培日記》，第九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08)，頁15，1945年2月14日。

⑤⑧ 1923年10月，直系軍閥首領曹錕曾以每票5,000元的價格收買國會議員投票，選舉自己為總統。這批議員遂被蔑稱為「豬仔議員」。

⑤⑨ 毛澤東：〈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1945年7月12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111、1115-16。

⑥⑩ 〈周恩來訪晤美國羅斯福總統特使赫爾利談話紀要〉(1944年11月27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致國務卿〉(1945年2月18日)，載《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下冊，頁386、434、437。

⑥⑪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47年10月23日、24日。

⑥⑫ 參見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23年9月21日、22日、24日，10月3日、4日、7日、9日、10日、16日、17日、18日、20日，11月1日各條。

⑥⑬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頁168。

⑥⑭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37年5月8日。

⑥⑮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45年12月5日。

⑥⑯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47年8月31日。

⑥⑰ 〈蔣介石致吳國楨電〉，《檔案與史學》，1989年第2期，頁26。

⑥⑱ 杜聿明：〈遼瀋戰役概述〉，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遼瀋戰役親歷記》編審組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頁17-18。

⑥⑲ 賈亦斌：《半生風雨錄：賈亦斌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頁165。1949年4月，賈亦斌在浙江嘉興起義，投向中共。

⑦⑰ 殷海光：〈趕快收拾人心〉，《中央日報》，1948年11月4日，第2版。

⑦⑱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464-65。

⑦⑲ 參見楊天石：〈蔣介石日記中的「兩岸密使」〉，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第五卷，頁381。

⑦⑳ 沈誠：《兩岸密使秘聞錄》(台北：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插頁。

⑦㉑ 楊天石：〈我所知道的沈誠兩岸之行〉，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第五卷，頁390。

⑦㉒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第四卷(香港：三聯書店，2017)，頁488-89。

⑦㉓ 楊天石日記，參見楊天石：〈我所知道的沈誠兩岸之行〉，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第四卷，頁489。另參見同名著作，下冊(北京：東方出版社，2018)，頁447。

⑦㉔ 參見〈習近平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革台盟台聯委員〉(2015年3月4日)，央廣網，http://m.cnr.cn/news/20151h/dj/20150304/t20150304_517881705.html。

楊天石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史哲學部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